

瑞安文史资料第十七辑

俞天舒辑

黄绍箕集

政协瑞安市文史资料委员会

瑞安文史资料第十七辑

主编:陈诒昆 陈成业 朱应松

责编:宋维远 陈维真

黄绍箕集

俞天舒辑

政协瑞安市文史资料委员会
一九九八年十一月

开本:856×1168 1/32

印张:14 1/4

字数:353 千字

承印:瑞安市印刷总厂

日期:1998 年 12 月第一版

封面题字:王汝丰

封面设计:黄秉桂

图版摄影:陈钦益

黃仲弢先生遺像



黃紹箕先生像



黄绍箕与黄绍第合影(右为黄绍箕)

黄绍箕故居东院一角



黄绍箕故居大门前照壁



黄绍第故居一角



黄绍第故居台门



解慶兄之服膺愛古之人之書
以爲得峰山典則之妙編也時
見模楷法內書家咸相寶幸

飛

雲

閣

全家獨老片松猿仰遠子為
之持世

黃紹箕謹識

黃紹箕手迹：飛雲閣匾額

陳叔暉示稿多化即徽上中批數字
送此底今陶隱現稿後送此底矣不飲陶即謝以
 法結下全刻一審新仲謹一處乃
 左抄為乾序送此底因札為素又同
 速而回已望湖上橋の件送此底檢供二
 紙又留得房乃注送此底不別時取
 多林病乃
 又送此稿一得
 月廿九日

黄绍箕手迹：与逸仲、志林书

惠睦兄長姻丈大人雅教

龍蟠道淵聰聲燭物

鴻漸衡門博學甄微

弟黃紹箕

黃紹箕手迹：行书联

仲愷世叔姻大人正腕

開統傳業下學上達

勤官正席合鰭履仁

姪黃紹箕

黃紹箕手迹：篆书联

序

作为黄氏后人,我对于祖上的历史,所知甚少,实在感到惭愧。家兄宗淮是一位历史学家,曾从温州图书馆收集过一些资料,试图做些研究,不幸宗淮在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,过早去世,因而未能如愿。

先祖绍箕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,曾助康有为上书清光绪皇帝,陈述维新变法之要义。光绪二十一年(公元1895年)在日本侵华的“甲午战争”中,清廷战败,签订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,割台湾,赔巨款,创深痛巨,举国震动。是时,绍箕先生竭力反对签约,并参与议定上海强学会章程,亲自赴沪筹建,以鼓吹自强及推动变法维新之举。光绪二十四年(公元1898年)在列强入侵,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,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戊戌变法,一批爱国志士认为兴学方能自强,由是乃倡导成立京师大学堂,绍箕先生出任京师大学堂总办,究心东西学制,手订章程。在任湖北提学使时,绍箕先生又曾东渡日本,考察教育,以资借鉴,并编著《中国教育史》等。绍箕先

生是近代中国最早放眼看世界的文化精英人士之一，他抱着强烈的爱国愿望，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，为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今年适值戊戌变法百年之期，抚今追昔，弥足深思，沧海桑田，神州巨变，改革开放，遍结硕果，上可以告慰先贤，下可以启示后人。

承家乡父老厚爱，不忘故人。兹值先祖绍箕先生专集出版之际，谨向积十年心血，并常抱病研究有关资料，辑成《黄绍箕集》的俞天舒先生及政协瑞安市文史资料委员会深致谢意，并作序以为纪念。

黄宗汉

一九九八年五月八日于北京

爱国兴学 风范长存

——读《黄绍箕集》感怀

宋维远

吾乡先贤黄公绍箕辞世于清光绪丁未年十二月二十日，即公历1908年1月26日，今年是他逝世90周年。去岁，瑞安市政协文史委有编印《黄绍箕集》之议，并嘱余协助此事，有幸得先读此书，读后，深受黄公爱国、兴学、勤奋钻研学术的精神所感动。黄公是晚清时吾乡难得的爱国士大夫、进步教育家和卓越的学者，他与吾乡另一先贤孙公仲容志同道合、互为股肱，时人尊为“二仲先生”。

爱国的士大夫

黄公自光绪六年27岁中进士起，至湖北提学使任上逝世的20多年，一直是清廷的京官和地方官，是当时朝野公认的爱国有识之士。他对当时清廷国力衰败，积弱难返，在军事上主将无能、屡屡失利；外交上屈膝投降，频频签订辱国丧权的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，受尽列强欺凌，十分愤慨。黄公不怕冒犯清廷投降派和朝贵们的怒颜，于1894年秋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联名上封事，力主抗击。又于1895年春，朝议对日媾和时，与丁立钧、徐世昌等联名上陈条，痛论割地赔款之危害，亟力谏阻向日赔款割地。

他所写的《与倭和议不宜割地折》，言词坦诚、激愤：“国家岂能竭有限之脂膏，填无穷之溪壑，（赔款）为数过巨，断不能迁就曲从；至于割地之举，则尤有必不可行者。”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久已垂涎台湾的严重形势，看得十分清楚；他责问：“台湾百姓何罪何事，而沦为异域？”他指出，中日甲午战败的近因是：“自扬兵以来，望风逃溃者，李鸿章二十余年所培养之淮军也。”而“百姓忠义之心则固自在矣。海域以拒倭而被害者二万余人，柳庄以杀寇而被屠者二千余人，老百姓亦岂真恶生而乐死哉？与倭不共戴天者也。今若割地，则必并其民而割之。是遇难之民因李鸿章之淮军、海军而死，而未死之民，又使李鸿章而弃之也。”势必数万生灵尽遭杀戮。”“夫李鸿章何德于倭，何仇于国？”他进而指出，日本“割东三省之地，则俄必随之割海口之地，则英必随之割南省之地，则法必随之。”最后中国必将“非惟永远无自强之日，抑且旦夕无苟安之时。”从这份奏折后数十年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实来对照，对国际、国内形势的政治洞察力断非满清一般庸官所能比拟！

黄公的政治责任心与爱国勇气与他的家庭不无影响。早在写这份奏折的六年前，他的父亲黄体芳任翰林侍读学士和兵部侍郎时，即疏奏俄使崇厚任意订约，丧权辱国；抨击工部尚书贺寿慈勾结商人，中饱私囊；弹劾“李鸿章治兵廿年无寸尺效，请别简忠毅大臣治海军事”。因而遭到慈禧“下吏议、降二阶”和“迹近乱政”的中斥。这种疾恶如仇的政治激情，无疑是对黄公深刻的“庭训”。

另外，又因黄公周围的其他爱国政治家对他的激励，

他在京师大学堂、编书局、译学馆任职时，特别是率团访日考察后，亲身感受西洋科学技术成果的先进；他便将爱国热情倾注于维新变法、自强振兴之中。先是结识康有为等维新人士，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陪同康有为到上海招集汪康年、黄遵宪等十多人成立“上海强学会”，其父黄体芳、堂弟黄绍第均名列会籍。并于戊戌年（1898）参加康有为成立的《保国会》，被推举为常任议员兼宣讲员。当年六月，光绪皇帝有意复宾师之礼，拟置学士、各顾问，将开懋勤殿，择康、梁与黄等8人宴见赐坐，讨论政事（后因戊戌政变，不果而罢）。戊戌政变时，又是黄公冒大不韪，预先给康有为通信息，嘱其速经海路赴日，使康得幸免遇害。而黄自己就因与康有为的关系而得罪慈禧，赖大学士徐桐以百口保之，才得释免。

张之洞是清廷大员中对黄公影响最大的官吏。黄公曾于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受业于张之洞门下，光绪十年又续弦张之洞兄张之渊之女，常协助张之洞办理重要文案，受张的洋务思想影响较深。

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黄公与其堂弟绍第并邀邑人陈虬等数十人加入上海务农会，并与孙公在家乡发起组织瑞安农学会，第二年易名务农会瑞安支会，公推黄公及其堂弟分别任正、副会长，孙公为研究部长。对于家乡的工商实业也同样予以热心关注与积极支持。孙公在黄公支持下任瑞安首任商会会长。由此可见，孙、黄二仲先生决不是关在书斋里不问政治的学者，他们把自己的学术与国家前途紧紧结合在一起。尤其是当孙、黄晚年时，对英